

藝術論文集刊 第三期

東周戈劍兵器銘文造形研究

陳信良

(抽印本)

25-47 頁

2004 年 12 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出版編輯委員會

東周戈劍兵器銘文造形研究

陳 信 良

摘 要

本文係根據近期研究拓本與摹本差異性的心得，再針對〈蔡公子加戈〉、〈蔡公子果戈〉、〈攻敵王光戈〉、〈王子于戈〉、〈宋公得戈〉、〈曾侯乙戟〉等知名出土兵器銘文作造形研究，過去由於此類兵器銘文的文字僅只於摹本或部分參照拓本的研究探析，而在拓本黑底白字不易賞析的條件限制下，都使世人無法一窺東周時期劍戈兵器上的文字設計真貌，今藉電腦影像處理軟體的協助，與精美圖版及拓本的蒐集整理比較分析後，期能在眾多學者編撰的文字編等書籍局限外，於文字造形賞析的展示應用上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關鍵字：東周 春秋 戰國 兵器 文字 造形 戈 劍 青銅器

一、前言

東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內容大多會明記監造鑄器者，這對研究不同諸侯國家歷史、鑄器特點、鑄器風格提供了依據。銅器銘文多程式化，如祭祀、媵器，以及兵器上的題銘，反映武器製作作坊或某地製造、督造者和物勒工名等¹。殷商時代的早期青銅器物上的文字，純粹只是記錄性質的作用，但至於工匠從何時開始對於器物上的文字有著「設計」的構想，是由何時開始？確切的年代已不可考，但東周以降，此類文字便逐漸多見。

書寫文字時，「對稱工穩」基本上是不合「人性」與「自然書寫」的原理，今人寫字不會像作文字設計，古人必定也是。談書家、書體或可，談人人皆能的「字體」時列為必要條件則很奇怪。即使被視為小篆前身的春秋〈秦公罇〉結體也不「對稱」。象形表意的漢字，依結構繁簡而有大小與長短而各異，是很正常的。商、西周的墨書文字如此，即使是刻鑄的甲骨文與金文也是如此，僅有例外是東周少數專業職工所能的美術字²。這些出土或是傳世的美術字大多見於製作精美的劍、戈等兵器上，而隨著青銅鑄造技術的提昇與熟練，文字的設計風貌亦不盡相同，將部分圖版整理賞析後，不禁讚嘆古人對文字造形的設計能力。

利用影像處理軟體將照片圖版中器物的雕鑿鑄造文字，做高反差等修飾處理，得到的圖版比摹寫的版本更清晰，且幾近原作（處理後的檔案，也可說等於原圖錄）。黑色的文字，取代原本的拓本上的白色文字，對於文字的藝術賞析更有實質的幫助。摹本或許可以作為文字學者考釋、辨識的依據，但對於藝術賞析的部分，真實還原度不甚充足，坊間關於青銅器的書籍，能清晰的介紹銘文內容者，除了照片圖版外，就是拓片圖版，再者就是學者的「摹本」，經由人為的手寫描摹，即使再小心、再精準，也已失去了原始的線條趣味³。本文係根據近期研究拓本與摹本差異性的經驗，再針對部分兵器上的銘文作探研，期能在眾多學者編撰的文字編等書籍中，於文字造形賞析的展示應用上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

本文中出現的「小篆」字形係使用中央研究院文獻處理實驗室製作的〈漢字構形資料庫〉⁴（2003年12月版，內含楷體字形57,820個、小篆11,100個、金文932個，異體字12,271組。）

¹ 杜迺松〈全國銅器鑑定所見金文考察〉，刊《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河南省博物館，第67頁。

² 林進忠〈曾侯乙墓出土文字的書法研究--附論小篆的真實形相〉，刊《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10月，中華書道學會，參-24~25。

³ 見拙著〈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刊2004《造形藝術學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⁴ 〈漢字構形資料庫〉下載路徑：<http://www.sinica.edu.tw/~cdp/>。瀏覽時間：2004年9月17日上午11：30分。

二、關於鳥篆文字

鳥書亦稱鳥蟲書，它是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時代盛行於吳、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諸國的一種特殊文字。鳥書為文字上帶有鳥形紋飾，蟲書則筆道盤曲如蟲，它們都是以篆書為基礎演變而成的一種美術字體。郭沫若認為蟲書是「於審美意識之下所施之紋飾也，其效用與花紋同。中國以文字為藝術品之習尚，當自此始」(《周代彝銘進化觀》)。鳥蟲書主要見於一些青銅器之銘文，尤以兵器為多。⁵

馬國權認為：「僅僅是個別的字附有鳥形符號，這是一回事；而真正作為系統的新興美術字體的出現，那應該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特別是早期的銅器銘文，圖形與文字往往結合在一起，究竟怎樣理解，也還沒有定論。如果祇據一兩個附有鳥形符號的字便肯定當時已有鳥書，這是缺乏充分證據的⁶。」的確，在鳥蟲文字的起源上，是難有足夠的例證來說明最早開始的時間，但通常把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河南省淅川縣單江口下寺 2 號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列為鳥蟲文字的濫觴。已知此鼎的時間為春秋晚期，而「鳥蟲文字」活躍於戰國時代，且其中的文字亦有鳥形等紋飾效果，說是創始，也應是合情合理的。



圖一

當人們不滿足只是將一般的文字書寫、雕鑿、鑄造在器物上時，自然的就衍生出經過精心設計的文字。這或可解釋說，為何在器物上形近日常書寫的文字較少，而設計過的文字器物較多的原因。在設計上亦需兼具釋讀的要求，否則就不成「文字」，而是圖案或純粹的「紋飾」了。而鳥蟲文字便是兼負有「裝飾」與「釋讀」作用的美術字。史延廷說：「崇鳥文化是吳越地區古代先民最具特色的習俗之一，他是該地區稻作農業文明歷史長期發展和累積的結果。作為吳越地區古代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種特徵，崇鳥習俗也影響著該地區的社會文化面貌，主導著吳越先民們的日常生活⁷。」

東漢〈張掖都尉棨信〉(圖一)，居延肩水金關漢代烽燧出土，此件棨信，即為烽燧守衛長官所用的軍事通行證幟，以木桿撐高持行，寫在縑帛的篆書每字約 9 公分，結字如同漢印設計布局，從線質表現可知所用的筆不是很大⁸。由於這件棨信的字體與常見的篆體有別，《說文·序》中有「鳥蟲書，書幡信也」之

⁵ 湯漳平〈從兩周金文看楚文學之淵源〉，刊《中洲學刊》，總第 119 期，第 5 期，2000 年 9 月，河南省社會科學院，102 頁。

⁶ 馬國權〈鳥蟲書論稿〉，刊《古文字研究》第十輯，1983 年，中華書局。

⁷ 史延廷〈鳥圖騰崇拜與吳越地區的崇鳥文化〉，刊《社會科學戰線》，1994 年第 3 期，吉林省社會科學院，113 頁。

⁸ 林進忠〈書法藝術〉，刊《書法之美》，1995 年 5 月，高雄市立美術館，58~59 頁。

言。李學勤先生遂懷疑它即是「蟲書」。他說：「“張掖都尉榮信”幾個字的筆畫多微作屈曲，與常見篆體不同，而與“薄戎奴”等漢印有近似處⁹。」馬承源先生亦認為如此。但陳昭容先生認為這榮信因當時原物出土時已變成皺折，絹面已破損，故使這些字的筆畫似帶有「婉」狀有關，並不是書幡信的蟲書。因此，陳先生認為李、馬兩位先生之說有可商榷之處¹⁰。筆者也認為此物上的文字應非「蟲書」，疑為使用的筆小且絹布本不易書寫又字體甚大，因而形成顫抖筆勢的線條。

嚴志斌〈鳥書構形簡論〉說：「叢文俊在《鳥鳳龍蟲書合考》文中將這類文字分為繁式、簡式、最簡式、變化式四種，但沒有給出明確的分類標準。觀察其文中的字例，簡式與最簡式的區別不明顯，而變化式亦是模稜兩可。公元前 500 年以後當是鳥書的鼎盛期，此前，則是鳥書的發創期。而此，正值春秋戰國之際。推測鳥書的發展模式是先並列式，後結合式，再化合式，但這並非新陳代謝式的。繁型與簡型出現都較早，孰先孰後不易推斷。這類書體中動物裝飾鳥形可以確指外，別的不易辨其物類。有時則有頭部為獸形而有鳥足、鳥尾者、實難名狀。而且，同一器上或同時兼用兩種不同的動物形裝飾，如蔡侯產劍，所以要在硬分為鳥、鳳、龍或獸等名目，不但沒有必要，而且也行不通¹¹。」

這樣的見解，筆者相當贊同，鳥蟲形狀這類的設計文字，取用的並非只有鳥、鳳等動物的形象，因為種類繁多、數量不一，無法作精確量化的分類，想要以單一名詞來分類區別，對於相關研究並無實質的幫助。當學界對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字動物形象的判定，無法客觀認定，是鳥？是龍、鳳？見仁見智的看法過多時，分類也無法客觀定義時，乾脆全都統稱為美術的設計文字，就是美術字。我們認為設計戈劍器物文字的工匠，應該沒有一定要用「鳥形」的概念來套用創作，而是以當時普遍流行或是共同欣賞的美感而製作的。

張傳旭《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與規律》說：「〈王子午鼎〉如果除去那些裝飾性的外表，在字的構成上，與當時日常通用的文字並無多大差異¹²。」目前大量出土的墨跡文字，多屬於戰國中晚期以後的簡帛文字，與〈王子午鼎〉（公元前 558~552），時間有些前後差異，但若將兩者相較，結構仍是不同（設計文字可能強調對稱、均等修長等美感，但書寫文字並不會刻意如此），再比較出土的墨跡文字，未見相同風格或結體的文字，在在的證明，這是為了器物所特定「設計」的文字，與日常使用的文字結構或有可能相近，但此絕非是「日常使用書寫」的文字。（實在因為傳統觀念中學界將鑄銘文字視為正統，墨跡文字視為草率急就之用的影響所致）。可知，這又是將日常「筆書」與刻意設計的「刻鑄」文字

⁹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1996年6月，上海書畫出版社，第3頁。

¹⁰ 許仙瑛《先秦鳥蟲書研究》，民國88年5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38~39頁。

¹¹ 嚴志斌〈鳥書構形簡論〉，刊《華夏考古》，200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¹² 張傳旭《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與規律》，2002年5月，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相互混淆的情況。把文字拉長，是當時普遍認同的美感設計，我們看春秋戰國的眾多青銅器，其中就有很多是「拉長」的設計文字，跟各國間的書風沒有絕對關係，就如同現代的藝術品設計，如果製作者只是將現今的文字，直接製作在器物上，毫不經過「設計」，此物品的「價值」必定有所折扣，因為「物以稀為貴」，從古至今，一般大眾的這種觀念一直都不變，普世認為設計過的文字，總是比較好，無論是藝術性或是特殊性都不相同。



圖二-1 局部



圖二-2 局部特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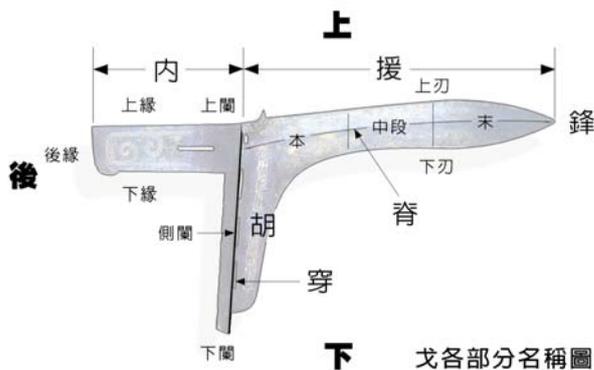
圖二-3 局部特寫



圖二-4 局部特寫

(圖二) 1978 年湖北省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彩繪漆內棺，為長方形盒狀，長 250 公分、寬 125~127 公分、高 132 公分，表面繪製有龍、蛇、鳥、獸、神等，其中的鳥蟲狀的紋路圖案，在當時的兵器刀戈上的文字裝飾應用，也普遍能見到。

三、戈、劍上的設計文字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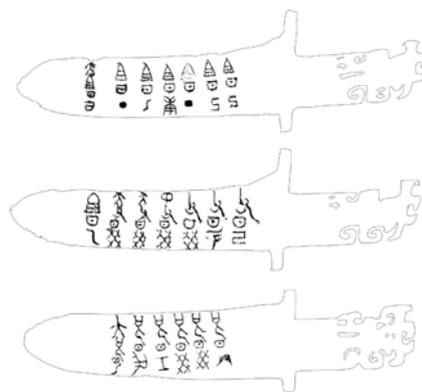


戈各部分名稱圖

兵器是古人用於狩獵或戰鬥場合中，進攻、防禦的主要工具。戈，在古代是一種主要的進攻性兵器，是用兩面刃的勾兵進行勾殺。戈的斷代有三點：(1) 援下刃的胡越長，弧度越大，年代越晚；(2) 援細長且上揚，上揚越大，年代越晚；(3) 內越長越上翹，且有刃者，

年代越晚。戈有三種形式：直內戈、曲內戈、鑿內戈。它盛行於商至戰國，秦以後漸漸消失¹³。

商晚期開始出現玉戈，其中有些是可供實戰使用的，但出土的大多數玉戈仍是儀仗用品，如河南省安陽市婦好墓中出土的玉戈達 39 件，均為儀仗用品，這些玉戈均製作精巧。商代的戈大多鑄有精美的紋飾，如夔紋等，有些還鑲嵌有綠松石。這一時期，開始了在兵器上刻字，也是兵器銘刻製的開端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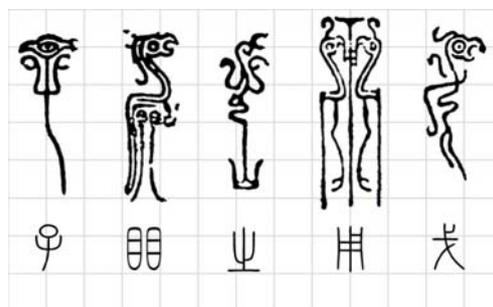
圖三

(1)這三件屬於殷代禮儀祭祀用的武器(圖三)，由左往右由上而下釋讀：〈太祖日己戈〉：大且日己，且日丁，且日乙，且日庚，且日丁，且日己，且日己。〈祖日以戈〉：且日乙，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大兄日乙戈〉：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主要是祖父兄三代祭祀時的的干支紀錄。

「細長」的設計文字在諸多的青銅器物上，不足為奇，反而鮮難看見設計成「扁平」的文字，可知古人的審美觀普遍認為拉長的設計比例是較具美感的。我想當時的器物製作工匠在設計文字與配置位置時，一定將器物的造型外觀一併列入考慮，如同印章印面的章法布局一樣，應由整體器物的布局位置設計去賞讀整體的趣味，若僅依單獨個字分析是有失客觀的。除了與其他前後時期的文字共同比對分析外，更需要配合器物的外表作全面的賞析，才能瞭解古人設計文字的方法，布字安排的巧思。對於春秋戰國時代在兵器上應用文字的設計編排，我們將於後實際舉例說明：

(2) 〈子眚戈〉

《集成》¹⁵編號 11100，一九三五年安徽省壽縣出土，曹錦炎先生認為係屬於楚國或鄰國之物，現藏上海博物館。五字沿著刀刃下



¹³ 程長新·程瑞秀著《古銅器鑑定》，2000年11月，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39~14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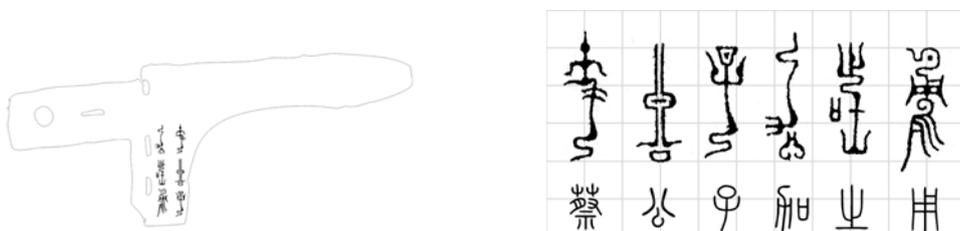
¹⁴ 楊平〈淺談中國古代勾啄兵器--戈的演變〉，刊《文物春秋》，1996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局，第39頁。

¹⁵ 《集成》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中華書局1984出版《殷周金文集成》的簡稱。

緣弧度布置，橫跨援部與胡部，釋文：「子 𠄎 之用 戈。」「子」字「口」形以鳥頭、眼飾化，「𠄎」字的下方延伸變為鳥足，原字僅佔極小空間。「用」字係兩相對望各叨一角的側身鳥形，可能是左右長豎畫影響，成為較方正寬闊的字形，若與他字的造形相較，不甚協調，「子」、「𠄎」、「之」、「戈」、四字的設計搭配看來最為恰當。

(3) 〈蔡公子加戈〉

《集成》編號 11148，出土地點未詳，胡部有錯金銘文 2 行 6 字，釋文：「蔡公子加之用」，今藏上海博物館。除「用」字外，其餘五字在直角轉折處都有「丿」形的粗筆處理，此符號即是此戈文字設計的關鍵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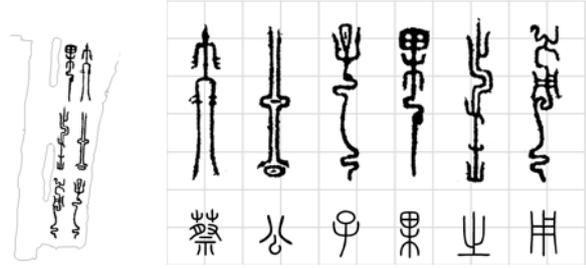
《金文編》¹⁶中「蔡」字的各種寫法：

〈九年衛鼎〉	〈獻鐘〉	〈獻鐘〉	〈伯作蔡姬尊〉	〈蔡姑簋〉	〈伯蔡父簋〉	〈蔡侯鼎〉
〈蔡侯匜〉	〈蔡大史錙〉	〈蔡公子義工匠〉	〈蔡侯鬬鐘〉	〈蔡侯鬬鼎〉	〈蔡侯鬬缶〉	〈蔡侯鬬戈〉

¹⁶ 本文所取用的《金文編》圖版內容，係容庚編著，張鎮林、馬國權摹補，1996年8月北京第5次印刷之版本。

(4) 〈蔡公子果戈〉

《集成》編號 11147，安徽省壽縣出土，胡部 2 行 6 字銘文，釋文：「蔡公子果之用」，現藏上海博物館。除「公」、「之」字是布局較平均外，其餘字的重心均在上方，1:4 的比例字形，文字的主體大約只佔一半，另外的空間則為線條的延伸。設計風格與〈蔡公子加戈〉接近，但字形比例稍微修長，「公」、「子」兩字部分空白處也都有留有圓點，林素清教授說此種作法是具有「填空」與「補白」意味，其具美化作用實不言可喻¹⁷。



(5) 〈左行議率戈〉 戰國中期

一九七〇年河北易縣出土，長 21.6 公分，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胡部有 5 字銘文，釋文：「左行議率戈」。一般習見的燕國兵器多為鑄銘，文字平直方整棱角突出，看得出是製模壓印鑄成。此件則為器成之後以刀補刻，書寫筆意雄強畢現。刻銘極為自然、質樸、可愛，是良好的刀筆書法金文作品¹⁸。再與他物比較，能知鑄銘文字與雕鑿文字的不同處，可說是各有千秋。



(銘文為原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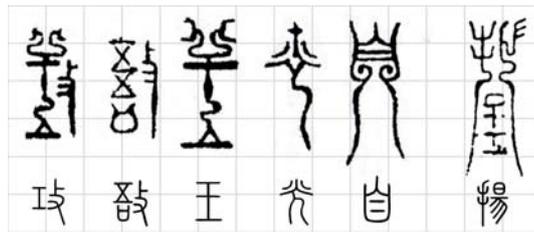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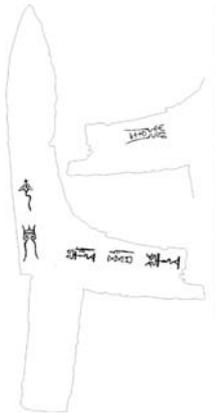
(6) 〈攻敵王光戈〉 春秋晚期吳闔閭

《集成》編號 11151，洛陽金村出土，援長市尺 4 寸 4 分、胡長 2 寸 2 分¹⁹，全長約 21 公分，故宮博物院藏。援部 2 字、胡部 3 字銘文，背後胡部一字「揚」，釋文：「攻敵王光自，揚（鑿）」。「攻」字稍有殘損，但仍可看出，此戈在「攻」與「王」兩字筆畫上方的 T 形處理皆為兩個相背的蟲形「𠄎」，或說「工」與「王」兩字處理方式都一致無異。

¹⁷ 林素清〈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民國 79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 32 頁。

¹⁸ 林進忠著《認識書法藝術》 篆書，1997 年 4 月，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第 5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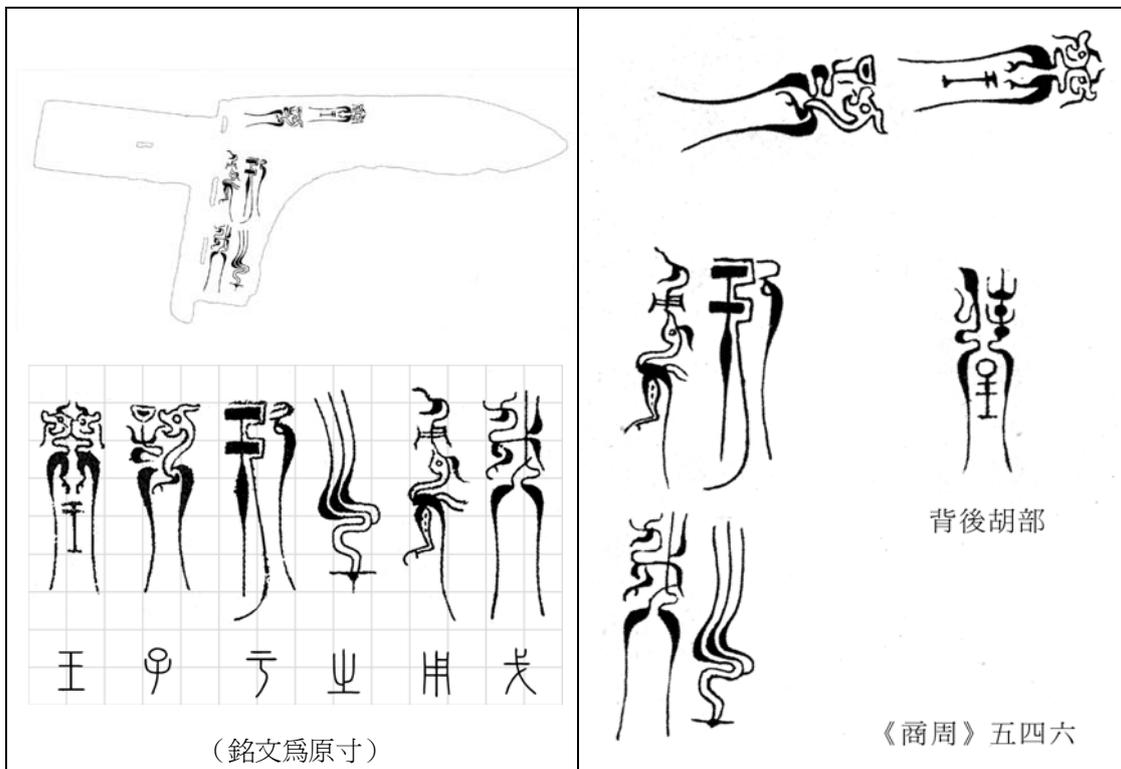
¹⁹ 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1992 年 12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第 114 頁。



(銘文爲原寸)

(7)〈王子于戈〉 春秋晚期 吳

《集成》編號 11207，一九六一年山西省萬榮縣后土廟附近賈家崖出土同樣的一對戈，現藏山西省博物館。此戈援長 16、胡長 9.5、內長 8 公分，援部 2 字、胡部 4 字、背後胡部 1 字，共 7 字錯金銘文，釋文：「王子于之用戈，揚（盪）」。曹錦炎先生《鳥蟲書通考》第 41 頁將「于」字釋爲「攷」，是將于旁的似鳥側形斷爲「欠」部，但愚見認爲該筆畫是鳥形裝飾。本字形取用《中國青銅器全集》11（東周 5），編號 76（第 73 頁）圖錄，根據及尺寸換算成實際比例。所以品質相當清晰，此圖錄缺少背後之「揚」字，請另參閱右圖摹本。以器物與文字大小來看，文字佔據版面比例相當大，《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以下簡稱《商周》）第二輯，編號五四六的摹本，與實物文字接近，算是描摹精確的摹本之一，但仍有些許遺漏，如「于」字右上缺一橫畫、「之」字下方少一短豎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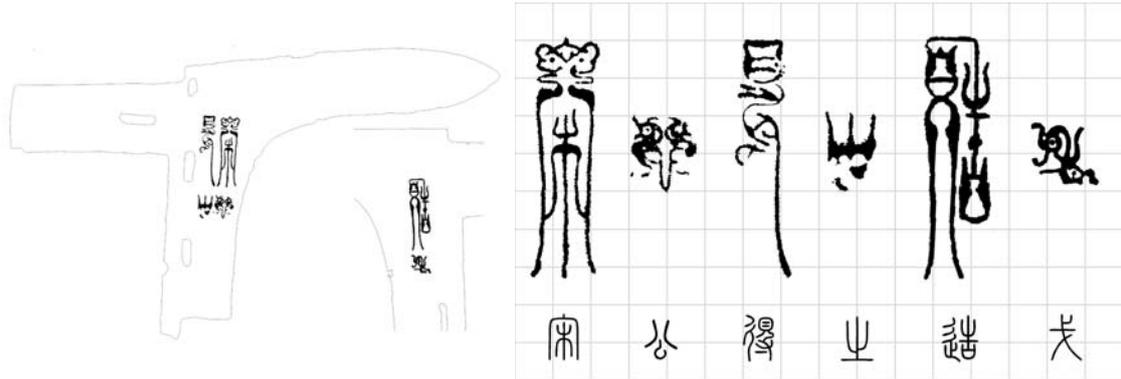


(銘文爲原寸)

《商周》五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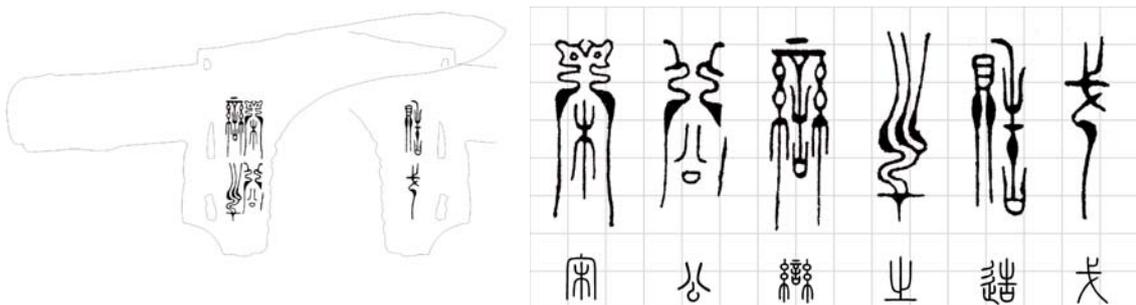
(8) 〈宋公得戈〉 戰國初期 宋

《集成》編號 11132，安徽省壽縣出土，宋公得在位 47 年，(公元前 450~404 年) 釋文：「宋公得之賄(造) 戈。」(「造戈」兩字於另一面) 因為字形變化自然協調，故兩長兩短的設計排列並不呆板，如「公」字是兩隻鳥背對張嘴鳴叫、「得」字象鳥休憩樹枝之側形，可惜「之」字殘損嚴重，無法得知原貌造形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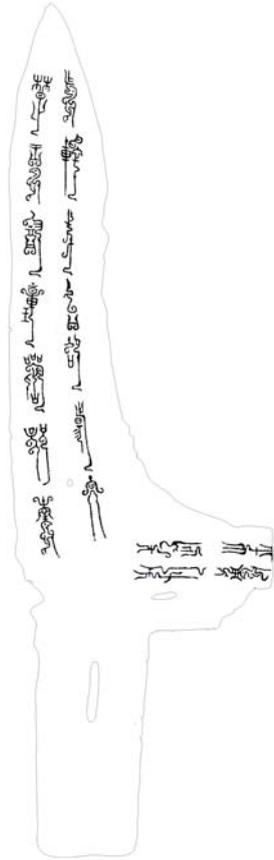
(9) 〈宋公欒戈〉 春秋 宋

《集成》編號 11133，一九三六年安徽省壽縣出土。春秋宋景公，釋文：「宋公欒(欒)之賄(造) 戈。」此戈六字均等排列，字座間各有疏密變化，每字逢彎曲拉長筆畫，都作「肥筆」(7) 處理，是主要的處理手法。文字的造形風格與〈宋公得戈〉除「宋」字相近外，其餘皆異。



(10) 〈楚王禽璋戈〉 戰國早期 楚

《集成》編號 11381，戰國楚惠王，銘文：「楚王禽璋嚴 狃南，乍(作) 輶(輶) 戈，己(以) 邵(昭) 揚(揚) 文武之戎用。」內容文字筆畫算是完整，惟「之」字下部稍有殘損。文字的結構大至是上密下疏，且有一長略斜豎畫，如「楚」、「禽」、「璋」等字。因為傾斜，不是筆直的豎畫，讓字形更為靈動不板，亦有視覺上撐高豎立的意味。遠觀銘文似有兩行並排的鳥群俯仰向上飛去的奇想。



寶	王	金	璋	嚴	祝	南
凡	君	戈	己	召	易	文
者	止	戊	用			

(銘文爲原寸)

(11) 〈鄧君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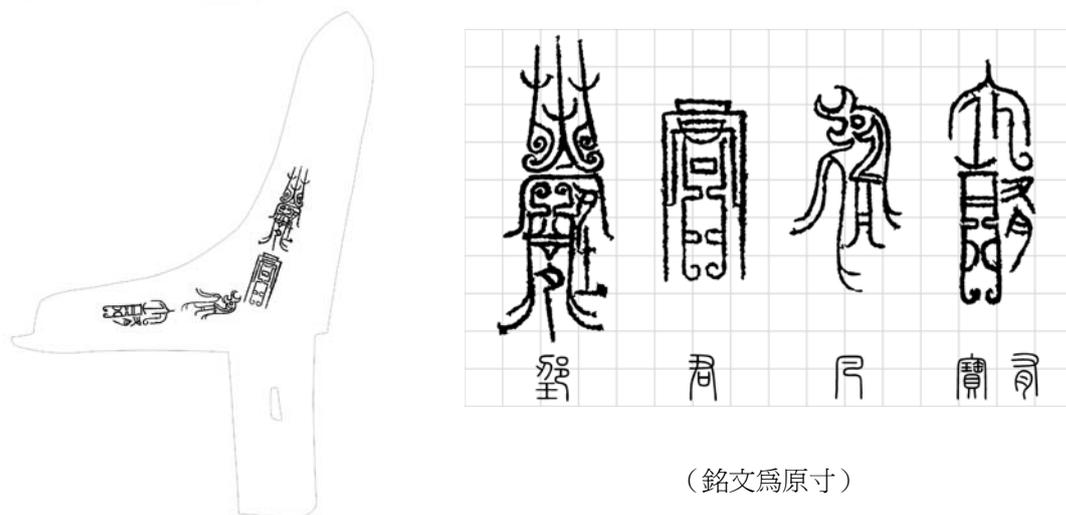
《集成》編號 11026，一九七一年湖北省江陵縣紀南拍馬山 10 號楚墓出土，通長 23、寬 4.7、內長 8.3 公分，現藏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館。援部 2 字、胡部 3 字，共 5 字銘文，其中有一個合文（寶有），釋文眾說紛紜，黃盛璋〈關於越王州句複合劍銘文的研究〉說：

「此戈被誤釋為『若君用寶』，《金文編》最後一版說是我釋，實是某古文字學者所釋，應正。我改釋為『邛(郢)君乍造』。第一字邛即郢君，為楚王族子弟封君，與郢君並列；『乍(作)造』，黃錫全先生承認應從拙釋，但第一字仍從某學者釋為『藝』，不僅從無其地，形音義全無根據，關鍵就在『除惡不盡』，而留無窮糾葛...²⁰。」

我們暫取《鳥蟲書通考》版本：「鄧君凡寶有」。「鄧」字最大高 4、寬 2 公分，有如一帶面具或臉上塗彩之人且頭插羽毛之類的裝飾物，頭略偏側，生動自然。「君」字以左右相稱上方下圓的造形構成，「凡」則是上端加飾鳥的側形，最

²⁰ 黃盛璋〈關於越王州句複合劍銘文的研究〉，刊《台灣龔欽龍藏越王劍暨商周青銅兵器》，2003 年 9 月，南京博物院編，南京出版社出版，5~11 頁。

後是「寶」與「有」兩字的合文。其中「寶」字的「貝」部設計與「君」的下緣雷同，有對應彎曲的雙勾。四個主要文字造形，大小不一、結構也不盡相同，似乎難以相互融合成一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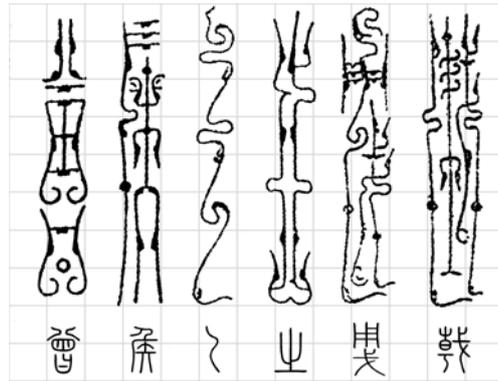


(12) 〈曾侯乙戟〉

《集成》編號 11173，一九七八年湖北省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三戈之一，此件亦是二件錯金銘文之一，通長 29.9 公分，胡長 12 公分，湖北省博物館藏。銘文在援部有 4 字，胡部 2 字，釋文：「曾侯乙之用戟(戟)」。此戟造形相當優美，文字裝飾確切得宜。本文附列的文字為「原始尺寸」，可知字體大小約在高 4 公分、寬 0.5~0.7 之間，字形的寬高比例高達 1:8，比〈王子午鼎〉²¹最高的 1:6 更多，如說是當時屬一屬二的「修長」的鑄銘文字，應當之無愧。「侯」字，《金文編》著錄：〈臣諫簋〉「𠄎」、〈量侯簋〉「𠄎」、〈麥鼎〉「𠄎」、〈魯侯鬲〉「𠄎」、〈國差簠〉「𠄎」，金文中的寫法所从實為「矢形」(亦狀似加飾點之「人形」)。《說文》：「侯」是鄉飲酒禮時所用的射布。從人從厂，矢在射布的底下。此戈中的「侯」字則是像一人站崗手持武器，在金文中算是相當特殊的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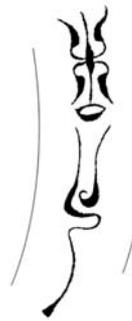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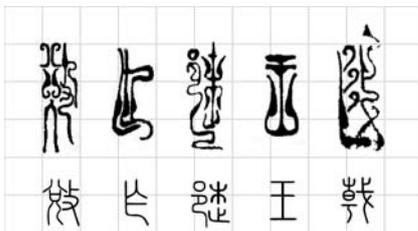
「乙」字，在狹長的空間裡蜿蜒轉曲，柔軟似如旌旗飄揚。「之」字左右豎畫各有四個半圓粗點，上方的圓弧相對向內「𠄎」、下方相對向外「𠄎」，有所不同。對於較長的線條，就加以全圓粗點「𠄎」裝飾，也兼具字體結構的穩定性。「用戈」為合文，「用」字包覆著「戈」，而「戟」的造形最為複雜，六字在獨立變化中，又具有統合協調的特性，如此精湛完美的設計能力，實屬不易。

²¹ 〈王子午鼎〉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河南省淅川縣單江口下寺 2 號楚墓出土，形制相同、大小不一，共有 7 鼎，各鼎銘文字體相近中稍有變化。



(銘文爲原寸)

(13) 〈斂戟〉



楚王會肖盤



楚王會肖鉶鼎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四)

《集成》編號 11092，一九九七年湖南省赫山廟 4 號墓出土，援部有 5 字銘文。釋文：斂乍（作）郟（楚）王戟（戟）。〈斂戟〉的「楚」字从木不从林，意同，寫法與〈楚王會肖盤〉、〈楚王會肖鉶鼎〉（圖四）字形結構稍微相近，不同的是左邊多了「邑」，或者說，很像「邑」形。此二物是將原本的結構改爲較狹長並省略一木的寫法，或因器物面積左右狹隘而改變寫法。

《東周鳥篆文字編》第 59 頁的「楚」字，編入了〈楚王斂作戈〉，但《金文編》的「楚」只收入了〈楚王孫漁戈〉、〈楚王會章戈〉、〈曾侯乙鐘〉等鳥蟲篆文字，《戰國文字編》（383 頁）與《戰國古文字典》（583 頁）兩書亦是，都未見〈斂戟〉？是漏了？還是認爲此戈的銘文並非是「楚」？從楚國的青銅銘文中幾個「楚」字的用例，都沒有類似這個左邊有「邑」部的寫法，由器物照片（圖五）與拓本（圖六）來看來，下方的「止」形都相當清晰，假如將木字下方的「止」當成是裝飾的筆畫，刪除後筆畫聯繫可能是如此（圖七），若比較〈郟越盟辭甲〉（圖

八)、〈邾越盟辭乙〉(圖九)「邾²²」字的寫法，兩者構形似較相同。

人為描摹無法精確，是我們一直強調的觀念，於此再舉一例；將「戟」字以各類圖版列示，可知描摹的失真程度，因為並非所有學者都能掌握到地一手資料，或親眼見到原物，也並非所有器物都能拍攝精確的彩色照片，所以拓本與摹本仍是研究文字造形必備的材料，但從此例來看，文字造形的準確度實在讓人難以信服。

			
照片	拓本	拓本反相 處理後圖版	《金文編》 82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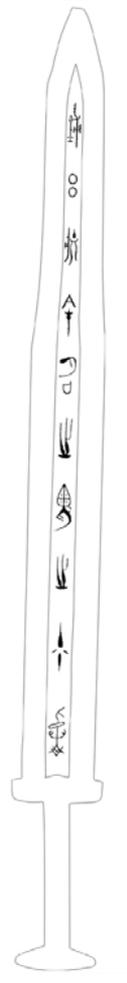
(14) 〈吉日壬午劍〉春秋晚期 晉



又名少虞劍，一九二三年山西省渾源縣李峪村出土，正背各有十字，劍長 55 公分，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左圖釋文：「吉日壬午，乍（作）為元用，玄鏐。」右圖釋文：「鑄呂（鋁），朕余名之，胃（謂）之少虞。」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說：「從目前資料來看，法國藏有同樣的一柄。一九一一年在山西原平又發現一柄，其鋒殘，與此件相比，銘文少「吉日」和「鑄呂」四字，其他完全相同，殘劍和銘文無銹無土，猶似新作²³。」

在書中取得全採全劍清晰圖版，將圖版以高反差調整，以幾近無失真的處理，取得銘文字形，在間距 0.5 公分，高 3 公分寬 1 公分的方格中，布入個別字形。因知〈吉日壬午劍〉全長 55 公分，即可換算其字形的正確比例大小，下頁中我們就以原寸的銘文圖版列表賞析。

其中「為」、「玄」兩字最長，將近 3 公分，每字的寬度大同小異，「為」、「鏐」、「胃」、「虞」因字形關係，將近 1 公分，「為」字在所有字形中，佔據空間最大，最為搶眼。每面平均布滿銘文，在劍身最為寬闊（中央）的幾個文字，肥筆明顯增多，顯然是製作者刻意安排的。「朕」字中小篆的「火」形，以似雨點肥筆表示，而「少」



²² 「邾」國名。春秋時邾國，故城在今山東省鄒縣，至戰國改稱為「鄒」，後滅於楚。亦稱為「邾婁」。姓。如上古時代顓頊的後裔，周時封於邾，後皆以國為氏。

²³ 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二），第 8 卷，1995 年 12 月，文物出版社。

字的「小」部亦是。

《東周鳥篆文字編》316 頁編號 142 亦有刊錄疑為同伴，因字形位置接近，似與此劍同，收藏處為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館，但其拓本邊緣有嚴重的殘缺破損之狀與《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二）編號 117、118（106 頁）的照片圖錄有所差異。

《說文》：「虞，鐘鼓之柎也。」是懸掛鐘、磬等架子兩旁所立的柱子，亦寫作「虞」。雖然今日所見與引用的「小篆」是為該器物數百年後，東漢許慎所整理的文字，兩者間年代差距甚遠，但在表列中，不難看出設計者在簡化筆畫、求取字與字間變化韻律的心思。

	
《金文編》 〈虞部鐘〉	《金文編》 〈蔡侯殘鐘〉

〈吉日壬午劍〉中「為」字下方並未有彎折拉長（原始照片可知），但《金文編》的摹本則有，可知該筆畫都是作者自己所添增的，除了形體失真外，已無法讓引用者瞭解最初的文字造形，又，取《商周》續 888 〈趙孟介壺〉拓本，經電腦反相處理得右圖，相較比對可知與《金文編》175 頁所載的造形有所出入。這種不經意的習慣性，是否包含整本書籍？值得探討。這種人為情感加諸的動作，實在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吉日壬午劍〉			〈趙孟介壺〉		
					
照片	照片反相	《金文編》176 頁	拓本	續 888	《金文編》175 頁

〈吉日壬午劍〉原寸比例字形列表										
圖示										
小篆	吉	日	壬	午	乍	爲	元	用	玄	鏐
釋文	吉	日	壬	午	乍(作)	爲	元	用	玄	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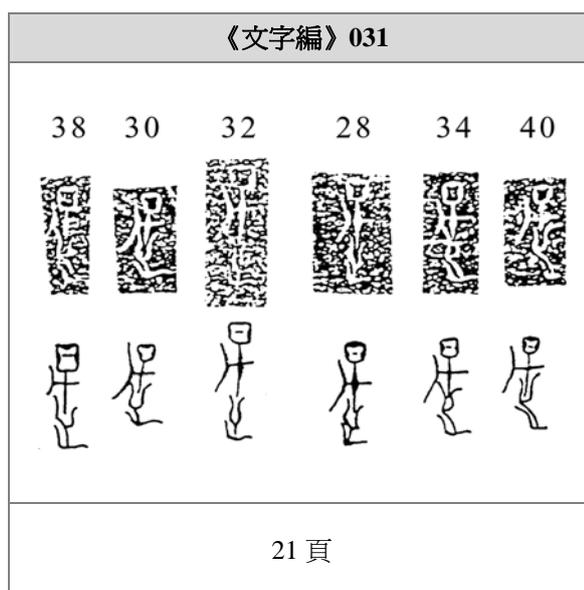
圖示										
小篆	鏞	呂	朕	余	名	之	胃	之	少	虞
釋文	鏞	呂(鋁)	朕	余	名	之	胃(謂)	之	少	虞

M2:38	M2:30	M2:32	M2:28	M2:34	M2:40
80-是					

《鳥篆》141	《集錄》
55 頁	74 頁

拙著〈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也曾對於摹本的誤差程度做過舉例，如：「80-是」，銘文各字「是」形傾斜角度各異，但仍保有一致風格。從《文字編》

²⁴所截錄圖版與摹本就可知，作者所用的版本已經是影印多次，反差對比極大、難以分出線條路徑、線質，是已與原拓變調許多的樣版。反觀我們所取用的是第一次掃描原拓版本，對比清晰，沒有影印過後呈現的高反差、黑線變粗（白色的線條相對變細）等困擾。《文字編》摹寫的文字，取用的影印拓本不甚理想，致有此弊。不可否認，剪貼影印的方式在目前文字學界仍是主要的編輯方法，但隨著時代的改變、科技的進步，基本的圖片掃描技術也應該應用於研究中，爲了研究的嚴謹、科學性，剪貼複印、人工摹寫的方法受限於人爲因素，有不夠周延之處，應當逐漸淘汰才是²⁵。



林師進忠說：「文字造形藝術」是指自由運用各媒材去探討多樣化文字造形表現的各種可能性，包括印、鑄、刻、畫、排列、貼、剪....等等，簡單的說，只要有文字造形表現的，都可歸屬此類，它可包括書法與非書法等在內²⁶。」

另，余義虎〈傳統文字符號與圖形的應用研究〉云：「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的裝潢功能在青銅器的兵器、樂器、禮器和日常生活用器上勃發了旺盛的生命力。該時期文字書體千姿百態，器物裝潢各臻奇妙，加上錯金、錯銀、錯紅銅的鑲嵌工藝的出現使文字產生璀璨的色彩，給文字裝飾美化到了錦上添花的效果。例如著名的越王句踐劍，在布滿美麗的菱格紋的劍身近格處，放置了兩行八個錯金銘文，文字鳥蟲形象傳神而結構巧妙，給冷兵器平添了幾分優美的裝飾效果。越國的其他劍，在劍身、劍格、劍盾上皆有錯金、錯紅銅或鑲嵌有綠松石的銘文，顯示了一種強烈的文字裝飾追求²⁷。」李明君先生編著的《歷代文物裝飾文字圖鑒》已將金文中出現的人形文字作了分類整理，我們擷取部分圖形，置於文後「附錄」，可供賞析對照之用。

²⁴ 《文字編》係《浙川下寺楚墓器銘文字編》的簡稱，附於李郁晴撰《浙川下寺春秋楚墓及其器銘研究》碩士論文，1999年，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²⁵ 見拙著〈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刊2004《造形藝術學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

²⁶ 林進忠〈巧涉丹青古字藝--東周秦漢字體變遷與文字設計的藝術表現〉，刊《臺藝藝術論文集》，第140頁，1999年10月，國立臺灣藝術學院美術學系系友會編。

²⁷ 余義虎〈傳統文字符號與圖形的應用研究〉，刊《社科縱橫》，總第18卷，第3期，2003年6月，甘肅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第61頁。

四、結語

從這些青銅兵器上銘文的造形變化來看，都是相當具有設計能力水準的，可知設計編排文字時都會與器物的大小、形狀、用途等作全盤性的考量，並非僅是取用「鳥蟲」之形或拉長變形等千篇一律的風貌。而要求文字造形的絕對還原，是研究前必要的先決條件。

「王」字在兵器上的造形表現：



〈攻敵王光戈〉 〈王子于戈〉 〈楚王畚章戈〉 〈斂戟〉 〈越王句踐劍〉 〈越王州句劍〉

余義虎〈文字裝飾五千年--傳統裝飾文字結構特徵及其涵義〉云：「美術字作為我國傳統的三種文字類型（日常應用文字、書法、美術字）之一，在漫長的發展演變中，逐漸形成了以書體形象為特徵的表現形式。而這一種書體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對較長的穩定性，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及不同的載體上，其美化裝飾作用效果顯而易見，如、圖形文字、鳥蟲書之於青銅器；篆書之於瓦當、璽印文字，宋體之於雕版印刷，等等。這些特性決定了美術字是有別於日常應用文字和書法藝術的一種圖案文字，是根據實用需要，利用漢字基本結構可塑性較強的特點，將字形本身經過創造與美化，通過一定的媒介使其產生、營造一種有裝飾效果和審美功能的文字藝術，與日常應用文字和抒發藝術情感的書法文字之間，無論是在功能上面，還是在工藝過程、審美意識方面均存在著較大差異，並且有較強的從屬性和較大的侷限性²⁸。」這種侷限性可說就是一種「特色」，具有特色的文字，總是較能吸引人們的關注，晚清印人將璽印文字之外的瓦當、陶磚、碑刻等文字取用於印面上，即是實證。這樣多種文字豐富營養吸收的滋潤下，就將印學發展帶入一個新的局面，直到今天，各種媒材文字的取法，仍是書法、篆刻等藝術創作的不二法門。

當初完成〈楚〈王子午鼎〉文字造形研究〉一文後，就計畫將編輯修復後的〈王子午鼎〉文字，根據現有的部首，再拆解分出其他的部首，如果部首數量夠多，依其造形再做繪製，就可形成一套「王子午鼎」風格的文字字型，這些文字圖形資料，結合自己對於網站資料庫建置的多年經驗，都將能放置於網站上提供大眾的檢索、賞析研究，其目的是想在研究資料的「再利用」上，作一點小小的努力。

²⁸ 余義虎〈文字裝飾五千年--傳統裝飾文字結構特徵及其涵義〉，刊《蘭州商學院學報》，總 19 卷，第 3 期，2003 年 6 月，蘭州商學院，第 11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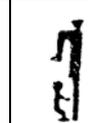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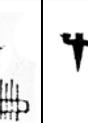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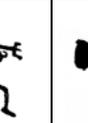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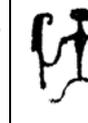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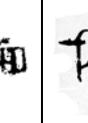
附錄：青銅器中的人物圖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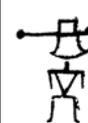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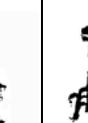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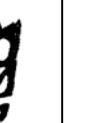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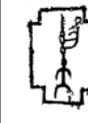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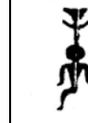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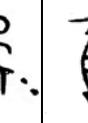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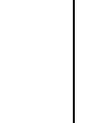
本表引用李明君編著《歷代文物裝飾文字圖鑒》，82~91 頁中部分圖錄。(以下所有圖示經電腦反相處理，故成黑字，原為拓片係為白字)。

◎ 表現生產勞動的圖形文字

◎ 表現生活和人際關係的圖形文字

◎ 表現崇拜、巫祝及舞蹈的圖形文字

◎ 表現征戰與軍旅的圖形文字									
									
									

◎ 表現殺戮、刑罰的圖形文字									
									
									

五、參考文獻

專書：

- 《保利藏金》編輯委員會《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1999年9月，嶺南美術出版社。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上、下冊，1998年9月，中華書局。
- 李中岳·張國生·李紅編著《中國歷代藝術·工藝美術編》，1995年5月，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 李明君編著《歷代文物裝飾文字圖鑒》，2001年10月，人民美術出版社。
- 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二），第8卷，1995年12月，文物出版社。
- 李紅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四），第10卷，1998年6月，文物出版社。
- 辰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三），第9卷，1997年12月，文物出版社。
- 林進忠著《認識書法藝術》①篆書，1997年4月，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 段書安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一），第7卷，1998年6月，文物出版社。
- 阿辻哲次《漢字の歴史》，1989年7月，大修館書店。
-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1988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屈原的故鄉—楚文化特展圖錄》，2001年12月，國立歷史博物館。

- 張光裕·曹錦炎《東周鳥篆文字編》，1994年9月，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
- 張圀生編《中國青銅器全集》東周（五），第11卷，1997年12月，文物出版社。
- 曹錦炎《鳥蟲書通考》，1996年6月，上海書畫出版社。
-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2001年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
- 程長新·程瑞秀著《古銅器鑑定》，2000年11月，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
- 楊泓著《中國古兵器論叢（增定本）》，1986年5月，文物出版社。

期刊、論文：

- 杜迺松〈全國銅器鑑定所見金文考察〉，刊《中原文物》，62~69頁，2001年第6期，河南省博物館。
- 林麗娥〈春秋戰國文字裝飾性特徵及其盛行因素之探討〉，刊《出土文物與書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肆1~48，1998年10月，中華書道學會。
- 林素清〈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一本，第一分，29~75頁，民國79年3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林進忠〈楚系簡帛墨跡文字的書法探析〉，刊《海峽兩岸楚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25~165頁，2001年3月，國立歷史博物館。
- 林進忠〈戰國時代中山國出土文字的書法研究〉，刊《藝術學報》第62期，57~75頁，1998年6月，國立臺灣藝術學院。
- 邵學海〈王子午鼎的繁縟與鑄客鼎的簡約--論楚國青銅藝術風格的形成與嬗變〉，刊《江漢考古》，1995第3期，59~64頁，湖北省文化廳。
- 徐在仙《吳越文字構形研究》，2003年6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張傳旭《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與規律》，2002年5月，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許仙瑛〈《東周鳥篆文字編》讀後記〉，刊《書目季刊》，第35卷，第1期，77~89頁，2001年6月，書目季刊社。
- 許仙瑛《先秦鳥蟲書研究》，1999年5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盛璋〈關於越王州句複合劍銘文的研究〉，刊《台灣龔欽龍藏越王劍暨商周青銅兵器》，2003年9月，南京博物院編，南京出版社出版。
- 楊平〈淺談中國古代勾啄兵器一戈的演變〉，刊《文物春秋》，1996第1期，36~40頁，河北省文物局。
- 劉興〈楚「王子午鼎」的書法藝術〉，刊《南方文物》，1997第2期，96~103頁，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叢文俊〈鳥鳳龍蟲書合考〉刊《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二期，1996年，99~126頁+左8。

